

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文学的跨国界与会通：苏雪林、 谢冰莹及钟梅音的南洋经历与书写

许文荣¹ 孙彦庄²

(1. 马来西亚 拉曼大学 中文系 2. 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

摘要：文学的跨国界现象在台湾地区与南洋两地早在 1950 年代就已产生。当时有一些台湾作家，尤其是女作家跨国界南行，扮演了文学大使的角色。本文以 3 位女作家谢冰莹、苏雪林与钟梅音为个案，观察她们的跨国界经历与书写如何促进两地文学、文化的交流与会通。论述从三个方面切入：一是跨国界让她们产生怎样的新的人生体验；二是从她们在南洋时期的人际交往看早期两地文坛的互动；三是她们的南洋经历与交往如何推动本身的文学书写。她们的跨国界之行不只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与人生经历，同时促进了马台两地的文学交流，除提携南洋青年作家外，也丰富了台湾地区文学的另类文库。

关键词：跨国界；会通；台湾；南洋；谢冰莹；苏雪林；钟梅音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started as early as 1950s. There were some Taiwanese writers, especially female writers, who went to Southeast Asia, played the role of literary ambassador. This paper studies Xie Bingying, Su Xuelin and Zhong Meiyin to observe how their border crossing experiences and writings promoted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t is to focus on three aspects: first, how the border crossing produced a new life experiences for them; secondly,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uring their stay in Southeast Asia in terms of the literary interaction of these two places; thirdly, to what extent their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on were the driven force for their literary writings. In short, border crossing not only expands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hile helping local young writer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border crossing; interaction; Taiwan; Southeast Asia; Xie Bingying; Su Xuelin; Zhong Meiyin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5)01-0115-14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5.01.009

一、引言

跨国界能产生跨文化的体验与认知,这对写作者个人不啻是珍贵的经验,也对促进两地或多地的社会交往与文化事业有积极作用。文学的跨国界在台、马两地的文学界早已存在,只是晚近学界较关注马华的旅台文学/在台的马华文学,不自觉地忽略了台湾文学的境外传播与影响。后者至少有三条线索可以去探寻:一是南来的台湾作家学者,尤其是女作家,早期有谢冰莹、孟瑶、苏雪林、钟梅音等,近期则有衣若芬等;二是嫁到海外的台湾女性,后来提笔写作,如马来西亚的戴小华、永乐多斯及唐彭、菲律宾的张琪等;三是学成回到东南亚国内的留台生,如大马的商晚筠、傅承得、方路、李宗舜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鼓励社会个人之间进行交往,以破除偏见,让超验系统与社会生活产生交接,达致思想文化的共识,同时也拓展与提升个人的理性知见,免受工具理性的绝对束缚[1:99-101,288-288]。从 1950 年代末开始越界跨域到南洋的几位与台湾关系密切的女作家,对两地文学界产生了怎样的激荡?对于她们个人的人生观、思想有着怎样的冲击?对于她们的写作又有着怎样的刺激与增进?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应该是有再思的意义。本文故以苏雪林(1897-2000)、谢冰莹(1906-1999)及钟梅音(1922-1984)为个案,深入挖掘这 3 位著名女作家的南洋行踪。通过苏雪林日记式的私人写作、谢冰莹的当地题材小说以及钟梅音与谢冰莹的游记散文,解读她们在南洋期间的生活、交往及书写,从中窥探早年两地文学交流的实况。

二、跨国界与新的人生经历

谢冰莹在 1958 年 1 月抵达马来亚。当时马来亚独立不到半年,百废待兴,需要外来师资提升教育水平。谢冰莹就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下来马,不只她个人,夫婿贾伊箴^①已比她早半年南来,同样也在太平的华联中学

^① 贾是谢的第三任丈夫,见唐潮《女兵作家谢冰莹的婚恋传奇》,《海内与海外》,1995 年第 5 期,第 10 页。

任教 担任教务主任兼化学导师 [2: 18 - 19]。此外,谢也把小女蓉儿^①带在身边,一家三口侨居南洋。从 1958 年 1 月到 1961 年 2 月,谢在这所马来亚北部著名高校服务,担任高中华文科导师兼主任,同时也担任女学生的生活导师,可见校方非常器重他们夫妇。

在马期间,于教学之余,谢一家偏爱旅游,足迹几乎遍布于马来半岛的土地。她在返台后即出版的《马来亚游记》中有几段记载“在马来亚住了三年零一个月,南自新加坡,北至亚罗士打,走遍了大半个国家,只有东海岸和玻璃市、吉兰丹、森美兰……几个地区没有去”,“热带风光是美丽的、可爱的,一年四季山野里总是那么披着绿纱,很少看到枯黄的树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够有机会多出去跑几个地方,增广见闻,总是好的。”[3: 1 - 3]她的南洋之行让她的游记写得得心应手,再加上她对马来亚这片热带土地的喜爱,使她笔下常带着感情,而非只是飞鸿雪泥的印象记。不只热带的景色,热带的人民也是她游记中所聚焦的对象。

谢冰莹的足迹虽然遍布全马,但也有最钟爱的地方。1991 年出版的《冰莹游记》(台北:三民)记述到世界各地旅游的经历,当中只收录 2 篇旅马时的游记,即《槟城极乐寺》与《太平山游记》,可以理解为她最喜欢这两个景点。《槟城极乐寺》没有收录进她 1960 年代出版的最早游记——《马来亚游记》里头,可能当时还未完成,或已完成但没有发表,如今补上。《太平山游记》则是《马来亚游记》里的一篇,但却被删减了一半的篇幅,颇令人纳闷。极乐寺是槟城最早的华人佛寺,由 3 位来自厦门的法师妙莲、本忠及得如,经过 15 年在周边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化募筹集所盖。谢游了极乐寺之后说,“此身有飘飘然的感觉,难道我真的游了一次极乐世界吗?”至于太平山,她曾经拿它与其它另外两个山区景点相比,即金马仑与福隆港,然后归纳说“太平山像一个纯朴的乡下姑娘,金马仑好比时髦的摩登少妇,福隆岗(港)像大家闺秀。若问我最喜欢谁呢?还是我的老朋友乡下姑娘。”[4: 41, 44, 79]

至于苏雪林的南洋经历,她自己认为,在南大执教的一年半,^②经历了 3 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新加坡的独立、马印对抗及三南大学潮。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亚独立,那时苏抵新已近一年。她是从孟瑶^③处知

① 谢冰莹的南洋之行,曾为了筹盘川而卖掉女儿蓉儿心爱的钢琴,这是她一直耿耿于怀的,但也显示了当年她南行的决心。

② 《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 1956 - 1966》把苏雪林列入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1965 - 66 学年度教师,职称是副教授,见第 79 页。

③ 孟瑶 1962 年便在新加坡南大执教,比苏雪林早到 2 年,因此对新加坡的方方面面比苏更熟悉,两人在新加坡时交往甚密。

道这消息,接下来好几天她都很关注这新闻,详细阅读相关报导。她可说是这桩历史大事件的见证人,尤其当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经典一哭”刊在报上,她可是“亲眼”目睹。^①苏每天早上必先阅报,就如她每天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对时事动态极为关注。有时因公假无报,她还抱怨新加坡假期太多。她对新加坡的独立,最大的关心点在新加坡与中共的关系上。她在 1965 年 8 月 10 日的日记中担心新加坡若和中共建交,她可能很快便得返台,不然恐怕教师证将被撤销,想回也回不去了[5: 405]。对于新加坡独立后,频频受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恐吓挟制,她又为新加坡愤愤不平,认为马、印应该让刚独立的新加坡自主自决,不应处处为难钳制新加坡。可见她在新住了一年,对这国家还是产生一定的“感情”的,虽然她经常对新加坡的社会与国民的态度有诸多批评,例如邮局职员差劲的服务态度、三轮车夫的粗暴无礼、学校行政职员官僚作风等,甚至感叹说“南洋华人今已自忘为中国人,排外性甚强,余等在此不止受马来政府压迫,亦受中国人压迫,可叹!可叹!”[5: 310]

南洋大学 1965 年 10 月间触发的学潮,苏雪林也是目击者。她在 10 月 27、29 日的日记中提到,“女生交一封宣言书,乃驳王赓武者,文理清晰有力。”这是南大学生驳斥王赓武教授报告书的宣言书。王赓武受李光耀委任,撰写南大改制的报告书,支持李光耀把南大改为英语大学,激起学生很大不满。“闻南大开除闹事学生 85 名。有中文系三年级两位学生被开除,即高人水、余集成。”[5: 443]从她的日记中得知,当年中文系学生也积极参与学潮,有的被校方列为“闹事学生”而被开除。10 月 30 日的日记写道“有男女学生 7、8 人来谈学潮事,意欲教授予以支持,但余等来此是做客,何能有所作为?军车、警车开入校园,驱逐那些被开除但又坚拒离开的学生。看来学潮尚须扩大,数星期内将无课可上,余对南大兴趣亦复索然。”[5: 444]果然苏不幸而言中,随着学生的罢课,苏真的无课可上。11 月 23 日的日记说“晚有学生来谈学潮,余以正言告知。”12 月 1 日的日记再提到“只有半数学生来上课,尚有半数坚持不肯屈服。如此办法,无非自己吃亏,他们究竟作何打算,不可知也。”[5: 457-460]

从这些记述中,令人感到纳闷的是,一向颇有正义感的苏雪林,并没有支持南大的学生运动,除了在学潮初期讲了一句“颇足令我同情”外,并没实际的支援行动。反之,在学生开始罢课后,反称他们为“闹事”、“无非自己吃亏”等。她难道不知学生以一颗单纯的心,希望阻止南大被改制为英

① 后来钟梅音也在《小国大人物》写李光耀这“经典一哭”,但却是从二手资料转述。

语大学,失去当初创办南大的意义?或许,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正如她自己所讲的,“但余等来此是作客,何能有所作为?”我们也就无法对她过于苛求。无论如何,苏雪林对南大学潮还是有一点贡献的,因为至今这学潮的文献只能在南大找到,但很多资料因某些客观因素已经不知去向,但苏雪林的日记却给我们留下不少弥足珍贵的文献。当时触发学潮的起源、被捕的学生姓名、罢课的情况等都写得相当详尽。

钟梅音在南洋的经历,最值得一谈的是她在信仰上的转变。她其实出身道教家庭,不过在1958年负责《妇友》的编辑工作时,其中一位编辑委员陆寒波曾向她传教。陆对她说“若你肯研究圣经,文章会写得更好。”[6: 48]钟在《往事如梦》中写道,若干年后,她真的读了一部份圣经,只是尚未“得救”。后来她旅居泰国3年多,浸濡在佛教气氛浓厚的泰国,对佛教给泰国人的安详与快乐也很欣赏,不过却没有皈依佛教。1970年到新加坡旅居前,她未曾到过教会。《在新加坡的日子》中她这样说“我从未否定上帝的存在。我从花里看见上帝,更从一切自然的美景与造化之奇妙体认上帝”,“也读过圣经,创世纪的说法和我的观念大致相同,耶稣说的话,我能了解的也很喜欢,但从未想到要去教堂。”[7: 204 - 205]后来一位在新加坡的友人骤逝,她去参加追思礼拜“是追思礼拜的诗歌感动了我,使我决定打醒起精神,更珍惜地走完这段剩余的旅程,学画也是那年圣诞节才开始,第二年五月就与外子一同领洗。”根据她自己在《往事如梦》的小注中交代,她与丈夫余伯祺是在1975年5月18日在新加坡圣公会教堂接受洗礼,之后她便积极参与教会,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天都到教堂参加主日崇拜。她曾经这么形容,在新加坡期间(1970 - 1976)她有3个家:一是自己的屋子,二是“新加坡游泳俱乐部”,三是教堂[7: 204 - 205]。归信基督之后的钟梅音,“其作品处处流露出对生命的礼赞以及面对人生的勇气。”[8: 1]

钟梅音在新加坡居住期间的第二件大事,是拜师学画。若从上段的引文中“学画也是那年圣诞节才开始”来推算,应该是在1974年的12月底。他的绘画老师是南洋著名画家陈文希,专攻花卉虫鸟。或许是具有绘画天赋,钟在绘画上进步神速,短短一两年便获得老师的青睐,办画展时邀她一起参展。后来她移居到美国,仍然继续画画,积累了相当的成果。1979年,美国洛杉矶的盖堡艺术学院为她举办个人画展,获得中外人士的好评[9: 60]。从另一个角度说,若钟梅音未曾旅居南洋,她或许不一定会信基督教,她的绘画天赋或许也不一定被发掘,因此跨国界使她的生命发生了另一种转变。

《海天游踪》(大中国图书,1966 年初版)是钟梅音的第一部游记,一推出后便卖得满堂红,到了 1978 年已出版第 16 版,一时无两。这部游记也成为一个范本,影响当时台湾的旅游文学。这部游记是她在 1960 年代中期环游世界 50 天后所写的,足迹踏遍东南亚、东亚、欧洲、美国等大小 13 个国家 25 个城市,绝对称得上是她这一生的壮游。这次壮游让她有机会首度游览泰国与新加坡,写下最早的南洋印象。无论如何,比起她后来寓居泰国与新加坡之后较深度的描写,当时的游记便显得蜻蜓点水了。在《星马行脚》中可知,钟第一次游新加坡,是由孟瑶接机。孟带她去南大参观。她对南大的环境挺喜欢,特别是背山面水的教师宿舍。她当时也描述了在南大的所见所闻:“我们抵达星加坡前一日,政府刚从南大捕去四十多名学生,南大墙外还贴着许多标语,措词的荒谬狂妄,一如大陆沦陷以前的学生标语。”钟梅音把南大学潮一味地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利用纯洁的青年作为政治工具”[10: 214],只掌握一面,没有看到学生自发的反南大被改制的另一面。这是她还未融入新加坡的社会语境前所作出的判断,正如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未从当地人/局内人的视角去看[11: 55-72],当然所下的判断是很片面的,完全只倒向官方的说辞。钟在新加坡旅居 6 年后于 1978 年出版的《这就是春天》的序文中这样交待:“当我写《海天游踪》(1966),序文里曾有‘恨铁不成钢’的话,没想到两年之后就去了东南亚,而且一去近十载(1968-1976)。”[17: 7]她前 3 年在泰国,后 6 年在新加坡,亲身在东南亚经历了当地的现实生活,与当地人自由交往沟通后,较能从当地人/局内人的视角去看,不再写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反之更能理解东南亚政治社会文化的特殊性,这是她在创作上与思想上的蜕变。

三、交往与影响

谢冰莹在南洋旅居期间,人际关系网建立得较广,文人中计有温梓川、黄尧、翠园、黄润岳、任雨农等,后 3 位还是她的湖南同乡。目前这些文人都已往生,无法得知当时的交往情况。根据谢在《马来亚游记》中写的,她在福隆港时,巧遇 4 位来自湖南的马华文化人,他们是黄润岳、陈植庭、彭海城及彭子敦。她异常兴奋,与他们合影一张[3: 74]。这让我们了解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以闽粤为大宗的大马华族移民中,有不少来自湖南的文人。除了同事、学生及校外的文友外,她也接触异族、园艺工作者等。她曾

经受邀参加一位印度老师的聚餐,体验印度家庭的生活氛围,特别是他们的食物与用餐方式。她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记载此事,提到印度咖喱的特别,印度人用手抓饭的方式,即只能用右手抓饭,不能用左手,左手视为不洁净,因为他们如厕后是用左手清洗的,握手时用左手也被视为是很“失礼”的。

根据马华文学史料学家李锦宗透露,在马期间谢冰莹非常热衷于推动文学创作,除了不时在从香港所引入不久的《学生周报》发表作品外,又在温梓川编的《光华日报》副刊与年轻人谈写作(部分文章后来收入《我怎样写作》[台北:力行,1961]和《梦里的微笑》[台中:光启,1967]),也在自己所在的学校鼓励学生从事文学创作。北马著名作家梁园就是其中一位直接受谢冰莹启发而走向文学道路的学生[12:29]。他曾经和北马的一些诗人、作家如陈慧桦、慧适等发起成立海天诗社,创办海天杂志,经营海天书店,一时传为文坛佳话。只可惜他英年早逝,在一桩疑似抢劫案中被歹徒击毙。根据华联的一位资深教师兼图书馆主任游振湘先生的追忆,谢冰莹带起的文风持续了好几年,那些没有被她直接教过的学生,也受到当时华联的文学风气所浸染,对创作兴趣盎然,其中一位到今天还在写作的是著名作家兼报人潘友来。^①

比起谢冰莹3年多的居留,苏雪林短短的一年半到底能给南大或新马文坛带来怎样的影响,确实很难用量化的方式去评估。文化的影响往往是耳濡目染的,有时是一种人格魅力的散发,有时甚至只是一瞬间的感动或启发。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两个20出头的小伙子,一位是她的中文系学生林明水(孟沙),一位是仰慕其名而来向她问学的黄孟文,^②后来都在马新文坛非常活跃,分别出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与新加坡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这难道只是一种机缘巧合吗?还是苏雪林的因素起着一定的作用?为了解答这问题,笔者特地往新加坡与吉隆坡访问这两位文坛前辈。他们都对苏雪林的印象很好,觉得她很直率、健谈、没有架子,也承认在创作上间接受到她的鼓励和启发。至于当年和苏谈话的详细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年事已高,已经无法记得很清楚,只依稀记得苏总是劝导他们多阅读、多写,笃实做学问。^③这是从两位前辈作家处所能挖掘的有限

① 笔者与游振湘先生的访谈,地点:太平华联独立中学,日期:2012年12月18日,时间:上午10至中午12点。

② 衣若芬意外在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图书馆发现当年苏雪林送给黄孟文的一本书,书上有苏的亲笔签名。见衣若芬《苏雪林日记中的南洋时光》,《联合早报》2008年5月18日,第24页。

③ 笔者与黄孟文访谈,2012年12月21日,上午10点半至下午一时,地点:新加坡黄孟文府上;笔者与孟沙访谈,2012年2月15日,下午3时至6时,地点:吉隆坡 Pearl Point 酒店快餐广场。

信息,但不难看出苏雪林确实对他们后来的成就有着间接的启迪。

相对于谢冰莹较宽泛的人际接触面,苏在南洋旅居时接触的文人、知识分子较少,和南洋文人中交往最多的是黄崖。^①黄崖是《蕉风》的编者。《蕉风》是马来西亚至今还在出版的文艺刊物,也是寿命最长的文艺连续出版物。从 1955 年创刊至今,已出版了超过 500 期。苏雪林在南大时,《蕉风》已创刊约 10 年。《蕉风》是接受美援的刊物,由当时位于吉隆坡的友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辑立场是倡导现代主义,与当时主导文坛的左派现实主义抗衡。黄崖经常把新出炉的《蕉风》寄到新加坡给她,也两次邀请苏雪林到马来亚去演讲,第一次去槟城,第二次到马六甲[5: 367]。两次都是《蕉风》所举办的写作讲习营,每场的参加者都很踊跃。这两次的马来西亚之旅,都是和孟瑶同行,孟瑶也是受邀主讲人之一。可见当时的《蕉风》非常活跃,注重人脉的建立,一旦有著名作家学者南来,便主动向他们邀稿或请他们去讲课等。

钟梅音与苏雪林、谢冰莹一样,在南洋期间,也接触了《蕉风》文艺杂志社的负责人。她在《漫游散记》(1974)中叙述说,当她们一家从东海岸看海龟产卵后,与同行的友人分道扬镳。友人一家返回新加坡,她们一家继续游马来西亚。到了吉隆坡之后,人生地不熟,正忧愁的时候,“幸亏文友姚天平先生却在这时候赶到。十余年前,姚君任香港友联出版公司中国学生周报的总编辑,我曾为他们写稿。不久之后,姚君转到马来西亚定居至今,曾屡次邀我游吉隆坡。”[6: 109]她所提到的姚天平,正是后来在马来西亚出版界非常知名的作家、出版家姚拓。他所经营的友联出版社曾经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公司,他本人也是著名的散文、剧本与小说作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毕生支持《蕉风》的出版,使《蕉风》成为出版寿命最长的文艺刊物。姚先生极尽地主之谊,带她们一家到离吉隆坡 30 公里以外的巴生吃海鲜,过后又带她们去参观博物馆等。姚先生也请钟一家到自己府上做客。钟这样形容姚氏夫妇“姚君任总编辑时,太太甘美华是执行编辑,夫妇俩志同道合,过着又读又写又画又编的诗意生活。”[6: 111]姚太太为人低调,钟的这些文字对研究《学生周报》与《蕉风》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让我们知道原来姚拓是夫唱妇随,对马来西亚的文学

① 黄崖(1932-1992) 学名黄约翰,马来西亚华人,生于厦门。1950 年代末自香港来吉隆坡,曾接编文艺刊物《蕉风》月刊,并担任《星报》、《学生周报》编辑。1962 年先后指导和协助文艺青年出版(麻坡《新潮月刊》)、(吉隆坡《荒原月刊》)、(北马《海天月刊》等。1968 年起担任南马文艺研究会顾问。长期从事文学创作,著作甚丰,长篇小说不下 7 部,包括《紫藤花》、《山村烟霭》、《吉隆坡的雨季》、《金山沟的哀愁》等。1970 年代中期逐渐淡出文艺界,1992 年在泰国曼谷辞世。

界、文化界贡献良多。与此同时，也揭示了马、台、港三地文学在当时的微妙关系。

钟梅音在新加坡期间与学者兼作家王润华及夫人作家淡莹交往甚笃。王氏夫妇经常受邀到她家里用餐。王润华回忆说，当时钟梅音在新加坡朋友不多，知道了他们夫妇都曾经留学台湾，并且喜爱写作，再加上他们也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因此很快就彼此熟络起来。钟梅音当时住在一栋很豪华的公寓，离公寓不远就是当时的中华游泳池。钟梅音很喜欢游泳，这与她从小患哮喘病需要锻炼有关，有时他们也在泳池见面。王润华形容钟梅音是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为人亲切友善并好客。^①王润华对他们两家人的交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受邀到钟的府上看昙花。王追忆说，他们得到钟通知说当晚昙花会开花，因此夫妇俩便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晚上8点就来到钟府等候。当晚昙花很晚开花，因此她们就一直聊天等候，最后终于等到昙花绽放的那一刻，白皑皑的花瓣，一朵接一朵地展现自己灿烂的容貌，然后又逐渐消逝自己的幽香。第一次看到昙花花开花谢，留下了很难忘的印象。当王氏夫妇回到家时，已经过了凌晨4点。王夫人淡莹仍然没有半点睡意，把当晚对昙花的情感化为诗句，写了一首名为《昙花》的诗：

守候三年/ 你应该觉察/ 这遽尔发生的/ 预兆：今晚八点/ 我决定
将过去/ 辛勤吸取的/ 天地精华/ 一点一滴/ 吐露出来/ 还给多难的人间

我下凡的跽音/ 响向葳远的黑暗/ 你无需侧起右耳/ 反正我灿烂的
容貌/ 必然会依时/ 一瓣瓣地绽放/ 在你冷寂的心眼

雪白是我的肌肤/ 雪白是我的身世/ 今晚，请记住呵/ 仅仅今晚，
你可以/ 沾着任何一支花蕊/ 深入我雪白/ 的梦乡，触摸/ 我易断的灵魂

凌晨四时/ 鸡未啼/ 幽香却散尽/ 我不得不/ 回去，捧着一脸的/
憔悴，向众花神启禀/ 我是怎样呕心沥血/ 把毕生的美丽/ 全部还给了/
这多难的人间 [13: 101 - 102]

这首诗表层虽是咏昙花，但深层文本则涵涉着淡莹夫妇与钟梅音的友情。“三年”可以指对昙花的等候，也可转喻为她们交情之久。其它字句

^① 笔者与王润华教授的访谈，2012年12月20日，下午3时至5时，地点：南方大学学院副校长办公室。

如“灿烂的容貌”、“一瓣瓣地绽放/在你冷寂的心眼”、“深入我雪白”、“毕生的美丽”等,都语带双关,可以理解对昙花的礼赞,也可视为诗人对双方友情的珍重。

四、记述与创作

谢冰莹在南洋时期的创作,以投给报章杂志为主。据李锦宗说,她当时积极给《学生周报》、《蕉风月刊》及《光华日报》副刊写稿[12: 29],主要是她熟悉这些杂志报刊的编者。她的游记最早应是刊在这些杂志报刊上,后来才汇集成书。比较特别的是她还在马来亚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由蕉风月刊杂志社出版,这是她少有的小说创作。她的创作非常生活化,情感比较丰富,大都就地取材,写本地花卉水果、异族风俗民情,也写华族的性情习为、文化教育概况等。

谢旅居马来亚 3 年多后所写的唯一游记《马来亚游记》,主要是以台湾读者为对象,以台湾的视角看南洋。若与杜运燮的《热带风光》(香港, 1950)对比,《热带风光》虽早 10 年出版,但两书的题材与写作方式几近相同,如介绍马来亚的天气地景、南洋民风习性、热带植物花卉水果、马来亚的历史掌故等。无论如何,两者的差异在于写作视角。南洋出身的杜运燮以在地视角来介绍南洋风情给中华地区(尤其是大陆与香港地区)的读者,而谢则以台湾视角来记述南洋的情调。关于这两本书的比较,实际上也可写成一篇专论文章。

作为女性作家,谢对女性的生活与命运极为敏感。在《马来亚的华侨妇女》这篇中,谢从女校工的生活经历推展到许许多多的华族妇女的辛勤劳动,“她们什么劳动都参加,包括修路工人、建筑工人、洗锡米、割胶。”谢认为最苦的是割胶女工,因为她们一大早就得深入胶园,随时有被强暴的危险;其次是洗锡米的女工,“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着琉璃女。”(应为“琉琅女”,琉琅是马来语“Dulang”音译,是一种盆状的洗锡米器具。)《马来亚的华侨妇女》是她写得最有感触的一篇:

每次当我看见我们的华侨男女同胞在修筑马路、桥梁,或者站在高高的两三层楼房上,伸着双手接着从下面抛给她们的砖瓦时,我看呆了!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马来女子、印度女人或者英国女人,参加这种辛苦劳力的工作呢?为什

么只有中国女人能吃这种苦呢？望着，望着，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在狂跳，我的热血在沸腾，我激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伟大的中华儿女呵，你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你们在海外流血流汗，修筑了无数条马路、铁道；挖掘了无数的锡矿；种植了无数的胶园；建筑了无数的高楼大厦，精巧美丽的小洋房；你们把荒地开辟成良田，使沙漠变成绿洲。为了筹款办南大，你们踏了一天三轮车，宁可自己饿着肚皮，也要献出来兴学，你们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啊！没有到过马来亚的人，想象中的马来亚，一定是富庶的，生活是舒适的；谁会想到这里的物价是这样昂贵，赚钱是这样不容易，生活是这样艰苦呵！我敢说，所有海外的华侨，都是克勤克俭，热心教育，热爱祖国的！他们有些一家七八个儿女都要上学，自己一分钱也不肯花，生活苦到不能再苦的地步，他们也宁愿捱下去，绝对不愿使儿女失学，这种爱护子女，维护华文的精神，怎不教我们感动呢？[3：122]

从这段叙述中可见，亲身到过马来亚的谢冰莹对当地的华人有了正确的认识，不再人云亦云，对华人在国家建设上的默默奉献感到钦佩，对他们的含辛茹苦也很同情，对华人社团的热心支持教育非常感动。她在1960年代初所出版的游记，肯定有助于台湾读者对南洋与南洋的华人获得更实质的认识与理解。

至于中篇小说《爱与恨》，据李锦宗的推测，小说主人公王十全可能是谢的一位学生，他因不满女同学移情别恋而刺伤了她，被判坐监3年。在坐监期间他痛定思痛，对自己的无知与冲动懊悔。后来女主人公王小英嫁给了一位刚死了妻子的中年鳏夫，而王十全出狱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成为一名好青年。情节简单，没有波澜起伏，反映了当时的早恋所导致的社会问题[12：29]。谢冰莹以写散文著名，小说创作并不多，这篇中篇小说可谓弥足珍贵：一、这是她在南洋写的唯一小说文本，二、以本地题材来进行创作，三、由本地的出版社为她出版。这篇小说有很浓厚的南洋在地色彩，包括小说的对白与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小说思维也是她作为一位师者教育理念的延续，即站在中学生不应谈恋爱的立场去写，带有教育理念先行的倾向，这与她在华联时也同时被委为女学生生活导师有关。当年肯定有不少女生向她咨询感情的问题，当然也辅导过面对爱情困扰的女生，因此这可能是启发她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苏雪林的南洋行踪以日记形式记述，属于纯私人写作。虽然她去世后成功大学出版了她完整保存下来的日记，不过在她写作的当下，不一定是

为着身后出版打算。由于是私人写作,文字直陈其事,不假修饰。对于所提及的话题,也没有进行背景铺陈,与谢冰莹与钟梅音的游记文学大不相同。苏雪林比较像记者,不加修饰地把事件报道出来,有时无意捕抓到第一现场或第一手资料,就如对南大学潮的记述。谢冰莹与钟梅音比较像游客,带着猎奇与寻美的心理,与读者分享她们“美的收获”。两人当中,谢倾向于生活型的旅者,深入民间,文字较富感情;钟属于学者型的旅者,文字较知性,经常参考报纸报道或学者的相关论文去写游记。

以知性见长的钟梅音,游记中的信息量不少,况且她也喜发己见,不写那种导览式的游记,而是具有半学术半文学的特质。例如写《小国里的大人物》,曾引用一位澳洲大学教授的观点,认为新、马有一天仍会合并。“可是当我四年住下来,发现至少在李光耀任上是不可能的,‘十年媳妇熬成婆’,今日的新加坡已是有头有脸的国家,不但在英属联邦里是个重要角色,就在整个世界局势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 146]她虽引用学者的文献,但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至少钟的观点,经过了 40 年,比那位澳洲学者还灵验。另外,她对新加坡的文化特征有细微的描述“有人批评新加坡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没有个性。我却以为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正是新加坡文化的个性,实际上他们还混合着印度与马来西亚的影响”[6: 139, 146]。这样的特征正是现今新加坡文化特征的实体展现,不得不佩服钟梅音在 30 多年前已具有这样的先知性眼界。

钟对游记的书写比较自觉。她在东南亚游记《昨日在湄江》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游记观:一是资料的收集,并非只是导览式的叙述。她认为:“要参考许多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包括民间故事与诗集,以及他们的古典文学”,“若不关心这些资料,华盛顿的樱花与日本的樱花又有什么不同?新加坡的平民大厦与纽约的哈林区,除了一个整洁有序,一个凌乱肮脏,又有什么两样?”二、是否有美化所走过的国家之嫌。“我想这是观念问题。因为我是出来旅行,并非考察;我写的是游记,不是报告。艺术是有剪裁的,如果作品只是事实的再现,那就不是文学”;“我曾在这些地方都过得很快乐,我爱那些人们的单纯与朴实,正如谁也不许碰一下我的‘台湾同胞’,包括我自己也不能否认的缺点,只许我自己在国内批评;一旦出了国门,我的祖国连同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6: 1-2]她以出国后不批评国人作对比,为一味说别人好寻找合理依据,这似乎不是同一个概念。不管怎样,她认为游记文学需要剪裁,并非现实的机械再现,在今天张扬文学性的时代,将获大部分读者的认同。

谢冰莹与钟梅音对南洋的异言中文(Chinese of difference) [14: 216]

颇敏感,整理了不少南洋与台湾不同的字汇词语,相信她们是最早谈论这课题的两位台湾作家。谢冰莹在《马来亚侨胞的口语》中揪出一些南洋特有的中文语汇,如“吃茶”为喝咖啡/汽水等的统称、“咖啡乌冰”是咖啡加冰块和糖不放牛奶、“生抽”为酱油、“原晒油”是指专门用来做红烧菜的黑色酱油、“脚车”为脚踏车、“打风”是指为(轮胎)打气、火是指灯(开火即开灯)、吃风为兜风、吃风楼为别墅、吃风亭为凉亭等。钟则在《两首小诗》、《从“做工”谈起》等文中大谈南洋中文的异质性,如“三万”为法院传票(英文 summons)、“做工”为工作/替人打工(拿薪水的那种)、“头家”为老板、“不懂”是不知道、“搞通”是明白了或知道了、“红毛”是指洋人等。反之,苏的写作明显比较注重时事性与思想性的事物,对南洋化的中文并没那么有兴致,或者可说比较后知后觉。她在1965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余直到今日始知黄梨即菠萝,即波罗密。”[5:414]也就是说,她住了将近1年才发觉南洋这里把凤梨称为黄梨,大陆称为菠萝,她又把波罗蜜与菠萝等同,在南洋“波罗密”是另一种热带水果,可见她又搞错了。

钟梅音的南洋游记比谢冰莹的马来亚游记晚10多年,有受后者影响的痕迹。例如谢以胪列的方式,钟梅音则以较灵活与可读性的方式谈南洋异言中文。钟的《两首小诗》以民间的打油诗来展示,其中一首为“土生最爱灭茶那,认得伦敦是祖家,不怕啰吱三万到,绝无出境二王花”(“灭茶那”是马来语 bicara,即诉讼的意思,“三万”是英文 summons 的音译,即法庭传票,“二王”指殖民时代的辅政司,“花”是英文的 warrant,驱逐出境的意思等)。另外,谢写异族的婚嫁风俗,而钟也谈及,《在莎地亚家“抹干”》便是她亲自参加马来族婚礼后的记述,比起谢只找马来学生来询问后写就又有所推进。再者,谢虽游遍马来亚大江南北,就是未踏足东海岸,而钟梅音后来特选东海岸为其旅游重点,并撰写游记,应是有意补谢《马来亚游记》之缺。换言之,钟虽受谢的影响,但又比谢更灵活,更有开拓性。

五、余 论

从台湾到南洋寓居的那段日子,这3位女作家在信念、思想与人生观方面是否有所转变?根据苏雪林1965年4月18日的日记中自述“预备论语、孔子之生平,甚有趣味,余对孔孟本来无甚好感,自读孔子有关之书(孔子家语、论语注疏数部),觉得孔子果是圣人。”[5:353]她在南大第一学期开设诗经、孟子;第二学期开诗经、孟子、楚辞、论语。在备课过程中,

她重新认真阅读与孔子相关的书籍,很奇妙地改变了对孔子的观念。

谢冰莹则对南洋妇女的耐劳力与艰苦劳作肃然起敬,对南洋华族的披荆斩棘与拼搏精神也另眼相看,特别推崇他们热心兴学办校的精神,开始了解华人在南洋一步一脚印的蹒跚步履。对他们有近距离与真实的认知后,不再人云亦云。钟梅音则在信仰上有重大的转变,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她在作品中不避讳地使用“上帝”,注入更多爱的话语。有时也引用圣经的金句,如写福州人随宣教士南来,英语很好,这样才能“修直主的道路”[6:3]等。

若有所谓的“文如其人”,谢、苏和钟这 3 位女作家的南洋经历与书写可以归纳如下:谢冰莹的个性与文字乐观飒爽,生活气息浓厚,就如开满遍地的胡姬;苏雪林则批判性强,孤立清高,犹如玫瑰;钟梅音则富文人雅士的气质,淡泊悠然,一如菊花。不论她们属于哪种类型,在她们跨国界的经历与书写中,会合与打通了两地的文学界,留下了一些可供后人解读与玩味的经历与文字,以及两地文人作家最早期的交往记录。台湾文学在为自己划界的同时,也应继续进行更多的越界跨域,吸收更多的养分。前人已立下了良好榜样,包括谢、苏、钟的南洋行旅,三毛的撒哈拉经历等,学界如何去归纳总结,或许是让台湾文学重新出发的理论基础与启发力量之一。

参考文献:

- [1]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Vol. 1* [M].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3.
- [2] 太平华联中学高中第二届毕业纪念刊, 1959.
- [3] 谢冰莹. 马来亚游记[M]. 台北: 海潮音月刊社, 1961.
- [4] 谢冰莹. 冰莹游记[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1.
- [5] 苏雪林. 苏雪林作品集: 日记卷·第四卷[M]. 台南: 国立成功大学出版社, 1999.
- [6] 钟梅音. 昨日在湄江[M]. 台北: 皇冠出版文化有限公司, 1975.
- [7] 钟梅音. 这就是春天[M]. 台北: 皇冠出版文化有限公司, 1978.
- [8] 钟梅音. 迟开的茉莉[M]. 台北: 三民出版文化有限公司, 2008.
- [9] 黄闻. 女作家钟梅音的后半生[J]. 民国春秋, 1999 (3).
- [10] 钟梅音. 海天游踪·第 2 集[M]. 台北: 大中国图书公司, 1978.
- [11] Geertz, C.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12] [马来西亚]李锦宗. 马华文学步步追踪 [M]. 新加坡: 青年书局, 2008.
- [13] [新加坡]淡莹. 太极诗谱[M].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1979.
- [14] 张锦忠. 南洋论述: 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3.